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作者肖余恨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暴涨暴跌背后的政府责任

最近,猪肉大涨,可以用“涨疯了”来形容之。据《人民日报》报道,有的地方猪肉价最贵的已经卖到每斤12元。同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香蕉价暴跌的新闻。也是《人民日报》的报道,海南徐闻县龙塘镇目前最好的香蕉每公斤仅售0.4元。差一点的,每斤价格只能卖上3分钱。农产品价格如此暴涨暴跌,如同冰火两重天,很难不让当事人随之打摆子。透过这种表面现象,则可以看出来,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不完全是市场的无情,而是政府责任的缺失。

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市场说话”的力度越来越大,因此“X贱伤农”的悲剧也在不断重演。这一次轮到香蕉了。虽然此次香蕉价格暴跌,有人归之于“香蕉SARS”谣言的传播与影响,但如果我们只要细加分析,就会发现,罪魁祸首并不在此。当然,这则谣言对香蕉的影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让当地香蕉暴跌至几乎白送没人要的地步。如果一个产业如此脆弱,一个小小的谣言就足以让其致命,恐怕就不只是“危机公关”应对能力有限的问题,而是这个产业本身具有的弱点和不足,谣言只不过是压倒它的最后

一根“稻草”。“去年徐闻的青椒、前几年的菠萝丰收之后丢在地上都没人要,这些代价太大了,香蕉产业应从中吸取教训。”可惜的是,当地政府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才导致今年香蕉丰收后却要遭如此困境。这个结局足以说明,当地政府在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政策、信息等公共服务方面,是严重失职的。搞好了“政府收获政绩”,搞不好“农民收获损失”。

如果说香蕉的暴跌还有偶然因素的话,比如谣言、偏僻一隅的徐闻运力不足等等,但生猪价格狂涨,以及因之带来的一系列联动则是必然的。猪肉价格暴涨的原因有很多,生猪收购价格看涨很大原因是养殖户感觉养猪风险大,补栏积极性不高所致。猪肉涨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饲料涨价,饲料价格又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目前的猪肉涨价其实是去年底粮食涨价的“余波未平”。尽管猪肉价格上涨之后,各地都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平抑措施,但如此暴涨还是会令老百姓“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如果政府对此具有预见性,及早预警并辅之以相应的措施,就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了——因肉价上涨而带来的上下游连锁价格反应,目

前还没有准确评估,但可以确定,影响不可小觑。

从猪肉和香蕉的冰火两重天,政府有关部门需要深刻反思。一是在宏观调控方面,有没有尽到责任。市场调控虽然是一种主要方式,但在政府的事关国计民生、在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却不能完全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否则,就肯定会造成猪肉、香蕉这样的价格大幅度波动,从而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冲击。二是在信息服务方面存在不足。以猪肉为例,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根据市场的反应,准确了解供应不足的情况,并向社会公布,恐怕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三是及时预警方面,政府部门也需要深刻检讨。徐闻已经连续出现丰收成灾的恶果,有关部门没有向蕉农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预警。在猪肉供应方面,也是如此,如果及早进行预警,及时调备猪肉平抑,恐怕也不会酿成这样的风波。

农产品价格的暴涨暴跌,原因有很多,但政府部门的缺位和失职,则需要深刻反思并加以改进的,否则,这样的暴涨暴跌还会连续不断,只不过,今天是猪肉香蕉,明天可能是鸡蛋、番茄罢了。这样的学费,不能再重复地付了。



【中国观察之杨涛专栏】
(作者杨涛系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副处长、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客座教授)

“投票拆迁”原来把大家都忽悠了

6月12日上午,北京酒仙桥街道办事处正式发布了备受关注的酒仙桥危改工程投票结果,在3711票实际选票中,有1/3居民表示“不同意”。酒仙桥街道工委副书记巴长瑞告诉记者,酒仙桥危改项目已经过政府批准,不是商业开发,不管存在多大困难都将积极推进。此次表决,主要是为了弄清楚居民对拆迁补偿意见的看法,并不决定拆迁的进程。

(6月12日《北京晚报》)我始终认为,在酒仙桥危改事件中,所谓的“投票拆迁”纯属伪命题。现在看来,酒仙桥街道的表态已经证实了我的观点——说白话,就是政府和开发商已经决定了必须拆迁,投票不过是让这种拆迁决定得到更多民意的支持,征求一下意见,披上一件“民意”的外衣,人家根本就没有打算让你投票来决定是否需要拆迁,媒体还直把它当作“民主决定拆迁”的样板来高调批判,这跟谁跟谁啊?

此次酒仙桥危改项目用投票来进行民意摸底,不过是政府更愿意多听听拆迁户的意见而已。但这种把民众意见作为自己决策补充的民主作风,决不等于让民众自己决定命运的民主制度。民

主是一种制度,它让人民进行公共决策,利用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民主作风是一种权宜之计,决策者仍然是个别人或者少数人。

把民主作风等同于民主,也就等于庸俗地将民主看成是一些官员的宽宏大量、礼贤下士,看作是官员的开明作风,也等于说封建社会也有民主制度。因为,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许多皇帝都会虚心纳谏,唐太宗李世民被魏征的忠言多次气得咬牙切齿口口声声说要杀死他,但如果谁说“贞观之治”时期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岂不是笑掉人的大牙?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决定拆迁”,那是政府和开发商没有决定甚至无权决定酒仙桥危改项目,是否拆迁完全是由此处的居民来投票决定。

是的,民主必须设定合理的边界,民主可以选举公共官员,决定公共决策,却不能干涉个人自由,不能决定公民的财产。否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如果民主不维护法治,民主就不会持续多久。”也会形成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但我始终认为,要谈论民主与自由的关系,要防止民主带来的祸害,至少应当在民主有了充分实施的条件下来谈,如果

我们所处的背景仅仅是官员的“民主作风”,那么谈论民主的话题不说没有任何意义,至少也是没有太大意义。

“民主投票决定拆迁”议题的出现,实际上仍然是政府设置的议题,它通过对民意的征求,让政府、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争议转换成为了多数拆迁户与少数拆迁户之间的争议,它虽然让民众有了意见表达,却掩盖了政府早就决定好了拆迁项目的实质。

“民主投票决定拆迁”对“针对拆迁政策补充意见的民意摸底”概念的偷换,把民主的内核进行了掏空,因为尽管“民主投票决定拆迁”可能损害公民的财产,但真正是由民众自己投票来决定是否拆迁,仍然反映了决策是由公众自身博弈决定,公众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有其可取的一面。

然而,仅仅是把一个“民意摸底”等同于“民主投票决定拆迁”,那么权力仍然还是在主宰我们的命运,民主就会庸俗地当作民主作风,官意仍然主宰民意。那么,我们既没有真正得到财产自由的保障,也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民主。

“关注投票拆迁系列评论”

从民生领域着手拽住物价飙升的脚步

■今日视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3.4%。分类别看,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8.3%。其中,粮食价格上涨5.9%,油脂价格上涨21.4%,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26.5%,鲜蛋价格上涨37.1%。这一系列数字创下了年内月度新高,CPI增幅也由此连续三个月触及或突破3%的加息“警戒线”。

(6月12日《羊城晚报》)即便这个CPI上涨指数已攀升至3.4%,已刷新了中国甚至世界上“史上最牛”的新高指数,依然有不少网友跟帖怀疑这个3.4%是经过“内部消化”后的数字。在他们眼里,排开住房成本

持续攀高的“大点”,一味言说肉食价扬的“小点”,无疑等同于“丢了西瓜捡起芝麻”。网友的质疑不无道理,我们只需罗列以下数字便可窥其理:

一次次的民调显示,有近九成的居民认为当前物价“过高或偏高”,感觉自己的生活消费负担比10年前更重,民众对物价指数上物价上涨很敏感;去年7月,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称,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一;今年1月底,美国杂志《国际生活》公布了去年“全球生活质量指数”,中国(内地)在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116。

这些数字在公民的“行、岗、屋、教、医”等民生

实景里,完全能轻易找到现实的投影。“行”:百姓出行难,出行成本贵,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中国居然有10万公里,加重百姓出行负担;“岗”:收入分配不公,用人体系设置不公,制度监督不全,就业歧视现象频现;“屋”:存在监管缺位与“乱位”,利益阶层抱团扭曲“房控政策”,房价涨幅高,一些监管者孰视无睹,少数地方房价涨幅趋缓,竟有市长为此揪心;“教”:义务教育法在一些地方成空文,虚高择校费成痼疾,高校高收费逼母死在猪圈旁的新闻仍在出;“医”:百姓期待医改草案趋缓,医生的呼声仍未得到回应,公民有病不能就医的悲情现实依然还在撕扯着国人神经……

民谚曰:“世间何是福,无忧则喜”。百姓对公仆为民解忧的全部信任,均源于自己基本生活之无忧。如果自己天天为吃、穿、住、行、医、教发愁,公仆纵然把“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百姓也是不买账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木桶理论”,指的是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木桶中那块最短的木板。当前,那些垄断行业所把持的住、米、油、行、水、电、气的价格,这么些年都在“与国际接轨”式增长,它们就如同最长的木板;而粮、油、房、医、教等价格上涨,收入分配落差加大,社会保障贫血,公平诚信缺失,则是中国这只“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它亟待我们去狠抓要脉。(周明华)

纪委监督别人,谁来监督纪委?

■公民发言

湖北监利县委书记怒斥县纪委腐败。他说,“县纪委机关现有干部职工40人,去年总支竟然达到310万元,人平近8万元,其中用于招待的费用近百万元。”

(6月12日《南风窗》)“打铁先得本身硬”。纪委是专门查处别人腐败的机构,纪委的个个都应该是严于律己的。然而,湖北监利县纪委更像是一个没人敢惹的特权阶层,其工作似乎就是罚款。监利县纪委每年的罚没款在300万左右,多数用来自己支配,发放奖金。县审计局和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可以审计任何部门,却唯独不敢过问纪委。

如果说监利县纪委在当地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话,那么,原纪委书记则更是高高在上。他可以随便“找人谈话”。凡涉及乡镇主要领导和科局一把

手的举报信,由纪委书记过目之后,依照和自己关系的远近亲疏进行处理。如果关系一般,先转信访室初核;如果关系很好,先放在自己办公室,然后约定谈话;如果关系很差,则被举报人就可能要“倒大霉”了。这种所谓的谈话,和湖南郴州的纪委书记专门用“双规”整人的招数没什么两样。

事情说到这份上,就涉及到对纪委作风建设和监督问题:纪委监督别人,谁来监督纪委?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没看到一种科学的制度设计。其实,纪委干部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任何人,当其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时,难免会被各种各样的诱惑拉下水。如果把纪委的工作建立在官员个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上,则无异于空中楼阁。只有从制度建设入手监督纪委的权力,才是长治久安之计。(济通)

车船税上调是否该问问百姓的意见?

■热点纵论

延续近21年的车船使用税停止征收,取而代之的是将于7月1日起随交强险一同缴纳的新车船税,缴纳税额上限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11日表示,国务院将《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进行了合并修订,新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对各类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和个人统一征收车船税。

(6月11日《新华社》)西方国家有句俗语:“人生在世有两件事无法逃避,一是死亡,二是缴税”。缴税当然是老百姓的义务,但政府征税是从老百姓口袋里往外掏钱,怎么也得讲点规矩才好。但毫无先兆的车

船税上调却像一枚猝不及防的导弹一样,把我这个小老百姓炸得晕乎乎的——这税怎么说征就征?好像已经完全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有这样的疑问并非我觉得低,实在是根据的。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就会知道,现代国家普遍都规定收税法定,即一切税收都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制定相关法律,方可进行。行政机关无权制定行政法规进行课税。如果说政府是个老百姓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管家,那么管家要提高收费当然要先问问我们的意见。有了这样的共识,再来看看突然上涨的车船税,你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

不说别的,单说征税的依据问题。已经征收了21年的车船使用税一直依据的是《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

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而非经过人大审议并形成正式的法律,这也就是说,在之前这么多年的车船税征收中,税务机关依据的并非国家法律,而仅仅是行政机关颁布的行政法规。这其实意味着,通常情况下政府想开征什么税就能开征,想征多少就能征多少。事实上,如果再深入查询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国现有的二十多个税种中,除了个人所得税等极个别的税种经过人大立法通过而征收的外,其余税种的征收居然全部依据的是条例、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

现在两个暂行条例合并修订了,新发布的征税依据却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这真能算是最新的黑色幽默了——这么严肃的国家征税行为,

却在根本上违背了“税收法定”的原则,不仅一错就是几十年,而且在以建设法治国家为目标的今天,居然还想继续错下去。

年收入12万以上人群个税申报工作搞得虎头蛇尾之后,税务部门动不动就说很多人的纳税意识很淡薄,这话放在税务部门并非依法征税的大背景下来看,实在是很有讽刺意味——税务部门连“税收法定”的原则都可以置之不理,你叫老百姓还能有多强的纳税意识?怎能不产生厌税心理?“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句话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没错,我们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但税务部门呢,依法而不是依行政法规征税是不是也是你们的责任和义务?(易其峰)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郭德纲为什么突然认错了?

■公民发言

消费者王立堂告“藏秘排油”虚假宣传案在北京崇文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代言该产品的郭德纲在庭前与王立堂达成“共识”,郭德纲表示已认识到违规,王立堂当庭撤销对郭德纲的诉讼。

(6月12日《北京娱乐信报》)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已经不是个别现象,郭德纲仅仅是众多明星中的一个。现在郭德纲认错了,那么,其他代言虚假广告的明星,是不是也该出来认错呢?

娱乐圈的事情,毕竟是一种娱乐。郭德纲认错现在仅仅是一种姿态,究竟会不会是借机宣扬自己呢?还要听其言,观其行。曾国藩教育他的子女:“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一个明星要真正红下去,炒作仅是权宜之计,最实在的东西,除了卓越的艺术之外,还必须有令人佩服的人格魅力。从另一方

面说,每一个明星背后都有庞大的粉丝群,而追星族又多是青少年,明星有责任以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已,这是他们应该具备的起码的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希望郭德纲一定要言行统一,不要让喜欢他的人失望。

郭德纲认错了,找郭德纲代言的“藏秘排油”企业错了没有?发布郭德纲“藏秘排油”虚假广告的媒体错了没有?答案是肯定的,都错了。郭德纲认错了,但企业和媒体还没有认错。郭德纲之所以会认错,是因为碰到了较真的消费者,上法庭告了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和媒体,是不应该等到较真者告后才认错的。其实,虚假广告这些年来大有泛滥之势,根本原因就是较真者太少。多一些较真的消费者,也就少一些敢于欺骗我们的企业和明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立堂和郭德纲都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叶雷)